

◆安庆人物谱

阮宜成：宜城的“眼睛”

鲁令琴

我和阮宜成先生认识，大概是在1985年。他到青少年宫，给马东升先生书法班的孩子们拍“火花杯”少儿书画大赛。我也喜欢拍照，一来二去，我们从陌生到熟悉。后来，我以安庆日报和安庆市广播电视台通讯员的身份，到他住的新华书店宿舍去采访他。

住处十分简陋。到处摆着纸盒子、编织袋，里面装的都是胶卷。柜子上放着三部照相机。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几年了，年幼的儿子和女儿在他们的外婆、舅舅、姑姑的照护下慢慢长大。

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份执著。他跟我讲，有一次去省新华书店开会，听说安庆要大建设，即将旧貌换新颜，看着那些老街巷、老建筑，他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不舍。他明白，时光匆匆，城市的模样会在岁月更迭中渐渐模糊，只有影像能留住过往的温度，让后人看见安庆昔日的样子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踏上了用镜头守护城市记忆的路。一辆旧自行车，一个相机包，利用下班时间，走街串巷，一走就是四十多年。

从他留下的照片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安庆一中旧门楣、杨家拐豆腐店、龙山路狭窄的马路、市委大院朴素的门脸、新光电影院那面有文化特色的高墙……他不愿错过城市的每一个珍贵瞬间——天刚亮，他就背着相机穿行在近圣街、胭脂巷

的青石板路上，捕捉老街的静谧烟火；太阳落山时，他站在江边，拍下皖江两岸的落日余晖；城市变迁的重要时刻、抗洪抢险的动人场景、黄梅戏婉转的舞台瞬间、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，都被他小心翼翼地收进镜头。

四十多年，寒来暑往，我们从熟人变成了好朋友。我亲眼看见他为拍一处老建筑，反复蹲守好几天，只为等最好的光线。为了记录城市的真实变迁，他走遍了安庆的大街小巷、拐拐落落，每一寸土地都留下过他的脚印。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，可他手里的相机从没放下，心里的执念也从没动摇。二十万张照片，是他日复一日的坚守，是他节衣缩食的付出，更是他留给安庆最珍贵的历史遗产。

儿女非常理解父亲对老城的情怀，能自立以后，就选择支持父亲拍照，各自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甚至结婚生子都没有麻烦过父亲。阮宜成在欣慰的同时，也觉得愧疚。有一年，在海南工作的儿子咳嗽不止，他让儿子回安庆看病。拿到诊断书，他整个人都吓懵了——肺癌。在求医问药的日子里，他陪在儿子身边，想起儿子从小就没了妈妈，而他自己也很少在家陪孩子，心里像刀割一样。

到了九十年代后期，阮宜成拍摄的重点慢慢转向了安庆的文化建设。迎江区文化馆在九十年代后期

到新世纪头十年，搞了不少文化活动。阮宜成一分钱报酬不要，心甘情愿给群众文化工作留下印记。从安庆举办第一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开始，他就走上街头、剧场，为每一届黄梅戏艺术节留下珍贵资料。

从2006年开始，他一直有个愿望：给自己镜头下的安庆办一次图片展。可惜囊中羞涩。几十年的拍摄，紫罗兰相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——他从来没有开过发票，那些留存的街景照片，全是他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。那阵子，他的照片也常常被其他爱好者借去用。他跟我聊起这件事，挺烦恼的。我说，你这么多的照片，这么珍贵的史料，捐给博物馆或者档案馆吧，它们到了该去的地方，千秋万代，就是安庆变迁发展的真实记录。2018年黄梅戏艺术展演周，已经85岁高龄的他居然还站在黄梅戏艺术中心的舞台上拍照。我忍不住把他数落了一顿。他呵呵笑着，连声说：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2021年，他把所有图片无偿捐给了安庆市档案馆。

2026年新春，听他女儿红莲说，老爷子住在养老院里。我去看他，他精神很好。他夸女儿孩子们孝顺。工作人员说，孩子们天天都来，老人家饮食也不错，他知足，所以长寿。

今年4月28日，阮宜成先生去世了。很多人看到过老安庆的照片，却没记住这位执着的记录者，但没关系，那些照片会记得，安庆这座老城会记得。若干年后，当人们从发黄的图片中看到老城昔日的模样，他们会从心底涌出敬意。阮老给安庆留下一座影像的档案馆，他何尝不是安庆的另一双“眼睛”？



初夏 周文静 摄

◆边走边看

成长的密码

谢光明

学校放假，我回到乡下外婆家，第一次学插秧。立夏时节，亮汪汪的田里蓄满了水，像一面面波浪形的镜子，曲线优美，照出青山白云。赤脚踩进田里，凉丝丝的田泥从脚趾缝间挤上来，滑腻腻的，带着泥土特有的腥气。

我被夹在大人中间，弯着腰，左手握着秧苗，右手一株一株地插进泥里。秧苗是事先捆扎好的，一把一把均匀地放在田里，要解开后再一根根分出来插进田泥里。秧苗的根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就像是一帮孩子紧紧拉着妈妈，分开它们的时候，不小心就会折断秧苗或拉断它们的根。太阳晒得背上发烫，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，挂在下巴上摇摇欲坠。半天下来，我就腰酸背痛，身体站都站不直。好不容易熬到收工，原以为休息一晚身体就恢复了，哪想到第二天腰更疼了，腿也疼起来，肌肉酸酸胀胀的，走路都别扭。外婆端来热水，一边给我泡脚一边给我揉腿，心疼地说：“才十四五岁，没做过农活，肯定会痛的。”

平时，我的身体也会莫名其妙的痛，特别是夜里睡觉，小腿的骨头像被谁捏住了两头往中间挤，又像有无数细小的芽要从骨节里挣出来。我常常在半夜醒来，摸着自己细长的腿，听见骨节发出轻微的声音，“嘎巴，嘎巴”，像竹笋拔节的声音。外婆说，这是长痛，小孩子长身体，骨头在长，筋在长，肉也在长，长得快自然会痛。我摸着脚，忽然觉得自己也是一颗秧苗，每一个夏天，都是一次移栽。从童年的荫蔽里被移出来，栽进更广阔的、更严酷的土地上。花瓣挣开花蕾，绿叶挣开苞芽，蝴蝶挣开蛹壳，小鸟破壳而出，它们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有生长痛？我想是会。

我不再为疼痛苦恼和难受，甚至以此为荣，因为这疼痛不是病痛，而是成长的密码。

◆流年碎影

我为老红军写借条

汤玉生

那天下班，对面副食品柜组的朱姐喊我：“小汤，我要回家拿些东西，你能来搭个手吗？”

“好哇！”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朱姐的爸爸是我打心眼里崇拜的老红军，能去见到心中的偶像，做梦都能笑醒。

朱姐家在镇子对面五六里远的村庄，平时她住在单位宿舍。一路上，我跟在朱姐后面蹦蹦跳跳。田埂两边的秧苗像是知道我的心事，也学着我得洋洋地在风里摇摆。“三夏”时节的太阳，好像怕耽误了农民收麦子、种水稻，下午六点多还热烘烘地挂在西山顶上。走了大约半个钟头，突

然，一位老农从菜地的豇豆架后面闪出来，跟朱姐打招呼：“芙蓉回来啦。”

“爸爸！”朱姐急忙上前，拿下她手里的锄头，有些生气地嗔怪道：“爸，这么热的天，您不晓得歇歇？”

我傻乎乎地看看朱姐，又看看被她喊作爸爸的那个人，心里头掠过一丝惊讶。老人六十来岁的样子，驼着背，但不显矮。白色的短衫被汗水浸透了，前胸贴后背，映出清瘦的骨架。黝黑的脸上，褶皱像刀刻出来似的，一棱一棱的。两只眼睛一大一小，小的那只陷进眼窝里，只剩一个孔洞。

老红军微笑着抬起尖尖的下巴：“还带了个小鬼来，以前没见过。”

“是啊，才来上班的小汤。”朱姐又说，“小汤，你不知道吧，我爸可是我们杨柳供销社的名誉主任哦。”

这回我倒没有太惊讶。一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红军，就担任这么普通的职位，还要自己种菜，跟农民有什么区别呢？

朱姐家的三间瓦房也显得陈旧，两面高墙上的灰砖脱落了不少。

朱妈妈从披间端来一钵子瓢子面疙瘩汤，喊我们吃晚饭。我原先

